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HINA FINANCE 40 FORUM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工作论文系列

CF40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CF40WP2018011 (总第 90 期)

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缪建民¹

2018 年 06 月 27 日

摘要: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的大背景下,二十世纪日美贸易摩擦提供的镜鉴和启示是,汇率调整并非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手段,应对贸易摩擦的经济冲击需保持政策定力,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谨防资产泡沫和产业空心化,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影响。

关键词: 日美贸易, 贸易摩擦, 经验和教训

说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本工作论文是未曾公开发表的论文。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论坛及作者所在单位意见。未经许可,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复制。

¹缪建民, CF40 常务理事,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缪建民

摘要: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的大背景下,二十世纪日美贸易摩擦提供的镜鉴和启示是,汇率调整并非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手段,应对贸易摩擦的经济冲击需保持政策定力,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谨防资产泡沫和产业空心化,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影响。

关键词: 日美贸易, 贸易摩擦, 经验和教训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容低估,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如何有效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二十世纪日美贸易摩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镜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贸易地位提升,日美贸易摩擦从1960年代初起始,1970—1980年代升级,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进入白热化阶段,最终于1990年代中期,以日本经济步入衰退而逐渐缓和,持续时间长达三十余年。回顾历史,日本政府对“广场协议”后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估计不足,日元升值并未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升级,国际贸易协调中汇率政策调整应审慎而为;贸易摩擦下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倒逼日本加快产业升级和海外投资,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导致了产业空心化;金融监管缺失助推资金“脱实向虚”,进一步推高宏观杠杆率,在助长泡沫风险的同时,加大了泡沫破灭后的通缩压力;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社会总需求萎缩,进一步增加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复苏的难度。



一、从汇率政策看，日本政府对“广场协议”后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估计不足，导致“日元升值恐惧症”，且日元升值也未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升级

尽管目前普遍认为，“广场协议”并非导致 1990 年代后日本长期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²。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场协议”后日元短时间内的剧烈升值明显超出了日本政府的预期，也没有实现削减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升级的预期目标。

“广场协议”前，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压力估计不足，协议生效后日元升值很快失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强势美元使得美国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受到沉重打击³，到 1984 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已经从 1980 年的 194 亿美元上升至 1091 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 462 亿美元，接近总额的 50%，强势美元与经济基本面出现背离，美元已处于强势周期尾声。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主动接受“广场协议”干预汇率，极大强化了市场对日元升值的预期，导致随后日元升值很快失控。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内，日元兑美元达到了日本政府认为的 20% 的升值上限，此后虽然日本调整了对汇率干预的方向，但为时已晚。1988 年初，日元汇率达到 1 美元兑换 120 日元的水平，比“广场协议”前升值一倍。进入二十世纪 90 年代，日元最高达到了 1 美元兑换 80 日元左右，是“广场协议”前日元汇率的三倍（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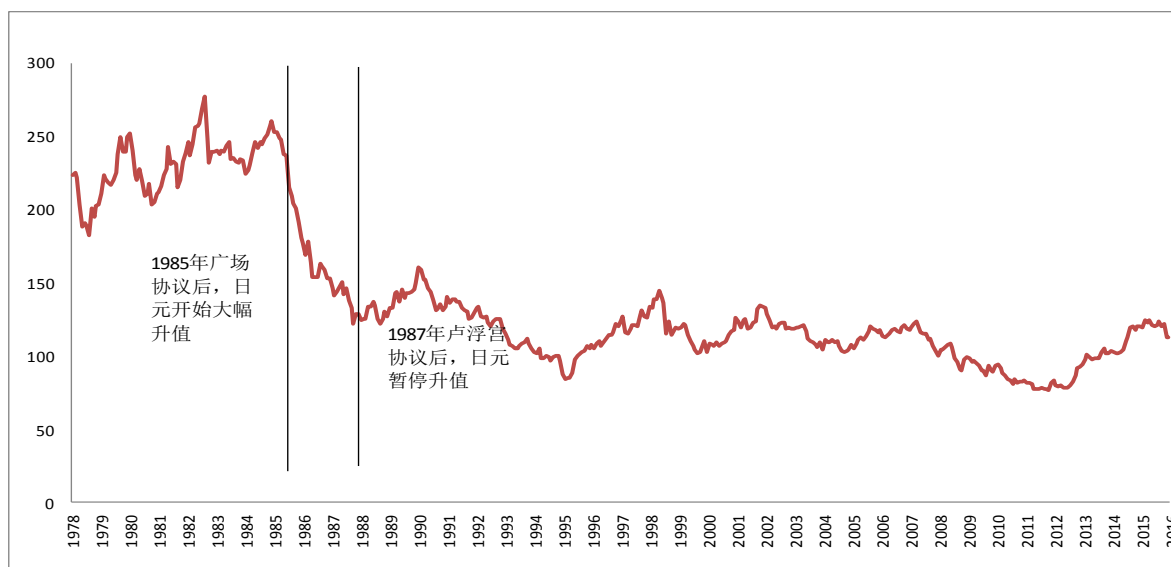


图 1 美元兑日元汇率变化情况

² 1985 年 9 月 22 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进行会议并达成协议，五国一致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这一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根据协议，五国一致行动卖出美元，总规模大约 180 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日本各负担 30%、德国 25%、法国 10%、英国 5%，预期使美元贬值 10-15%。

³ 美国这一轮强势周期始于 1979 年沃尔克上任美联储主席，为了打击通胀，沃尔克持续提高利率，最高达到 20%。紧缩的货币政策很快控制了通货膨胀，美元也随之走强。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没有达到削减贸易顺差的预期效果，日本在汇率上的妥协让步并没有改变美国贸易保护的立场。由于“J曲线效应”的存在⁴，在“广场协议”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恶化。在汇率调整未能奏效后，美国将视线移向市场准入，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比如，1985年，双方达成“市场导向型个别领域协议”，要求日本放松对电器通信、林业产品、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子计算机等领域市场准入标准，扩大日本对上述美国优势产品进口。1988年，为迫使日本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祭出“超级301”条款，使日本所有出口商品都处于美国贸易制裁风险之中⁵。与此同时，美国还要求日本修改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在美国的压力下，1986年和1987年，日本先后发表两份“前川报告”，指出日本经常收支顺差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应转为内需主导。1989年，美国与日本就消除两国间的结构性贸易障碍达成协议，以推动日本在反垄断法、专利法、定价机制等方面改革。从“广场协议”后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变来看，日本在汇率问题上的主动妥协退让并不能阻止贸易摩擦升级。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日美贸易摩擦逐渐平息。

“广场协议”的重要启示是，日元被动升值，不仅无法达到削减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升级的预期目标，反而给日本国内宏观政策调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国际贸易协调中汇率政策的调整应审慎而为，避免引发剧烈变化的“休克疗法”。在这一过程中，面对美国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日本主要是根据本国主导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分阶段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通过企业联合改组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有效防止了外资对本国产业的冲击。目前，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主要工业品市场，基本被本国产业部门所占据。

二、从经济发展战略看，贸易摩擦下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倒逼日本加快产业升级和海外投资，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导致了产业空心化

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改变，创造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逐步由“贸易立国”转向“海外投资立国”和“科技立国”并重。

在“海外投资立国”方面，日元持续升值加快了日本制造企业海外转移的步伐，在打造一个强大“海外日本”的同时也带来了盲目投资和产业空心化等问题。随着发展战略向“海外投资立国”转变，在日元升值的推动下，日本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1990年跃居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所得收支盈余首次超过贸易盈余，成为日本国际

⁴ 一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该国贸易收支及经常帐户收支状况一般并不能立即改善或恶化，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这种经常帐户收支变动的轨迹成英文字母J的形状，所以被称为J曲线。

⁵ 1989年，美国认定日本在大型计算机、卫星和林业产品方面封闭市场，动用“超级301”条款进行调查。在美国强力外压下，日本最终就上述产品达成市场协议。但由于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效果并不理想，对日贸易逆差未见改观，布什总统对日本开放市场的要求进一步升级。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对日本实行了更为严苛的“结果导向型”贸易政策，日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



收支经常项目的最大顺差来源。截至 2017 年，日本海外净资产已达 428.45 万亿日元，连续第 27 年保持全球最大海外净资产国地位，成功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海外日本”。但是，日本这一时期的对外投资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泡沫经济时期的海外投资中不乏盲目冲动。1980 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的财富效应极大刺激了日本海外投资的热情。当时的日本将海外并购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手段，大量购进企业和不动产，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 1989 年日本三菱财团买下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大厦⁶和索尼公司斥巨资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⁷。之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大量海外投资变为不良资产，并迫使日本企业转而低价贱卖，造成巨额损失。另一方面，大规模海外投资导致产业空心化。在纺织品、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部门全面转移的同时，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未能弥补国内产业转移形成的空缺，加剧了日本产业空心化，成为长期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汽车、电子、机械等日本支柱产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在 40%至 60%之间，有的企业甚至高达 70%。

在“科技立国”方面，日本大力推进科技研发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成功转型为先进的创新型国家。战后初期，日本比较成功的工业产品大都是在美国完成基础研究，再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在日本进行应用研究和商品化。进入 1980 年代，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单纯依靠“技术引进”的模式不能促进日本经济的持久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基于此，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战略⁸，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日本在技术研发方面有 4 个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分别是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列世界第一、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二、专利授权率高达 80%。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7 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 39 家企业入榜，力压美国的 36 家高居第一，这是日本在近三年中第二次名列第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各国工业竞争力报告也充分证实了新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制造业领域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上游的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核心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制造方面，日本无可争议地处在领先地位。

⁶ 1989 年，日本三菱地所收购了洛克菲勒中心的 14 栋办公大楼。按照原定计划，三菱公司预测 5 年后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将达到 75 美元。但由于美国经济低迷，导致房地产不景气，洛克菲勒中心的实际租金只有每平方英尺 38 美元至 40 美元。因此，三菱公司一直没法盈利。1996 年，三菱地所不得不宣告洛克菲勒中心项目破产，14 栋建筑卖出 12 栋。

⁷ 1989 年 9 月 25 日，索尼公司斥巨资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试图将索尼打造成集硬件生产和内容创作为一体的行业巨头。但事后的经营管理状况，远远超出了预想，让索尼公司吃尽了苦头。收购 5 年后，这笔交易造成了 27 亿美元的亏损，导致索尼公司成为日本历史上亏损额度最高的企业。

⁸ 其标志是 1980 年日本通产省发布了《80 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文件。同年 10 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中再次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战略。到 1990 年代中期，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新战略，强调日本要彻底向“模仿与改良的时代”再见。



三、从货币政策看，日本采取了长时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日元升值的经济冲击，为日本“泡沫经济”埋下了隐患

由于是典型的出口型经济，“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出口以及经济增长均产生了较大的冲击⁹。为对冲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日本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经济泡沫处于高位时又过快收紧，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政策失误。

一方面，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日本央行延缓加息，错过了货币政策纠偏的有利时机。由于1970年代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带来的债务压力，1980年代后日本逐渐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特别是1982年成立的中曾根内阁以紧缩财政为目标提出了“不增税的财政再建”的方针，极大制约了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即使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带来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日本仍坚持财政平衡主义，并未大规模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体现在国债余额上，日本国债余额GDP占比在1986年达到最高记录42.7%之后持续下降，1990年底为38.1%。在财政政策缺位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和扩大内需，日本央行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降息，将贴现率从5%降至2.5%的历史最低水平，累计下调250BP。此外，由于受到“卢浮宫协议”¹⁰要求日本扩大内需的政策压力和日本国内“日元升值恐惧症”的影响，当1987年日本经济趋于好转且美国开始加息后¹¹，日本仍保持2.5%的“超低利率”一直到1989年5月，持续时间长达27个月，错过了加息的有利时机（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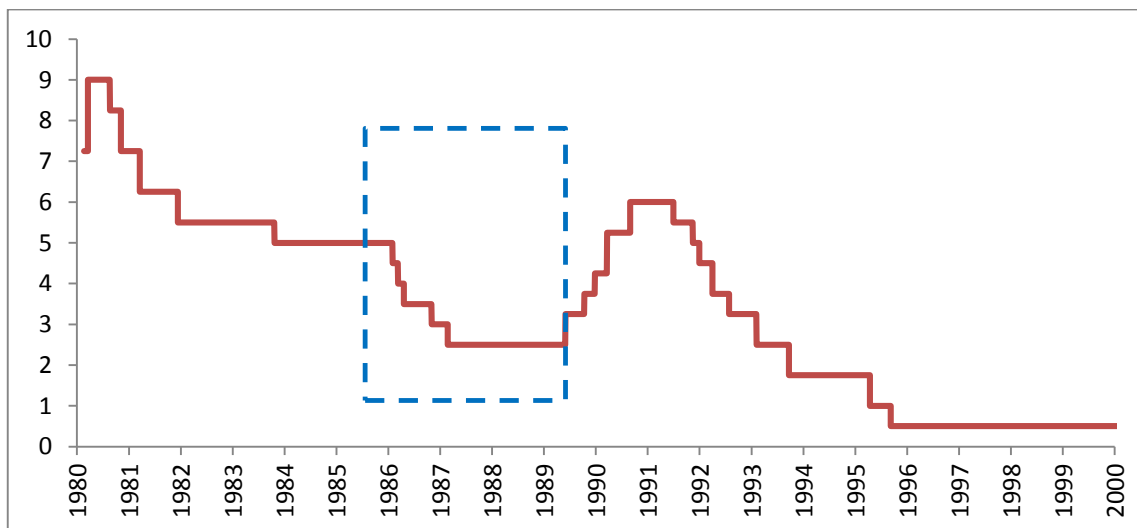


图2 “广场协议”后日本贴现率变化情况

⁹ 广场协议后，日本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到1986年的-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6.17%下降至1986年的3.18%，到198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开始回升至4.11%，1988年进一步回升至6.49%。

¹⁰ 卢浮宫协议是1987年2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卢浮宫达成协议，采取联合措施，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以阻止当时的美元币值下滑，保持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

¹¹ 从1987年1月到1989年5月，美联储二十余次上调基准利率，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自5.88%上调至9.81%。



另一方面，在经济泡沫高位阶段，日本政府选择了主动挤泡沫，导致股市暴跌和房价崩盘。1985—1990年间，受宽松货币政策推动，日本M2同比增速从8%上升至12%以上，从银行体系源源不断溢出的流动性进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一时期日本股市指数及主要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均出现大幅增长，流动性催生的资产价格泡沫迅速形成。1989年，日本银行意识到金融风险。1989年5月底，日本政府正式启动金融紧缩政策。首先是日本央行持续升息，1989年5月将贴现率从2.5%提高到了3.25%，到1990年8月进一步提高至6%，一直维持到1991年7月1日，直至把泡沫彻底击破（见表1）。为配合日本央行紧缩政策，1990年大藏省又出台了“不动产金融总量政策”，规定不动产贷款增速不能超过全部贷款增速，管制对象除银行外，还包括信用金库、信用合作社、人寿保险等。在一系列金融紧缩政策作用下，日本股市房市大跌¹²。受资产泡沫破灭的影响，日本寿险公司的实际投资回报率逐年下跌，由1990年代初期的7%左右持续下跌至2000年的2%，泡沫经济时代出售的大量高利率保单带来了严重的利差损，直接导致1990年代后期日本多家大型寿险公司相继破产¹³。

表1 日本银行短期连续提高中央银行贴现率（%）

时间	1989年 5月	1989年10 月	1989年12 月	1990年 3月	1990年 8月
原贴现率	2.5	3.25	4.25	5	5.25
上调后贴现率	3.25	4.25	5	5.25	6

事后看，日本政府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面对已有外部压力，不是选择改革来应对，而是通过货币宽松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延续繁荣，导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持续上升，之后在高位强制打压，将日本经济带入长期衰退。

¹² 1990年3月20日，日经225下跌近1000点，标志着股市泡沫崩溃的开始，至1992年8月，日经225指数跌至14000点，距离此前峰值38000点，下跌了近60%。同样，地价和房价也一落千丈，日本6大城市和全国平均土地价格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冲顶，随后开启了漫长的下跌之旅。截至2017年，日本6大城市和全国平均城市地价指数分别较最高点跌去了74%和66%。

¹³ 1997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日本已有8家人寿保险公司相继宣告破产，他们分别是日产生命、东邦生命、第百生命、大正生命、千代田生命、协荣生命、东京生命以及大和生命。在这场危机中，财产保险公司也无法幸免。2010年5月，日本第一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宣告破产。



四、从金融监管看，金融自由化下的监管缺失助推资金“脱实向虚”，进一步推高宏观杠杆率，在助长泡沫风险的同时，加大了泡沫破灭后的通缩压力

1984年，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加快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见表2）。在货币宽松的背景下，监管缺失为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提供了通道，进一步推高宏观杠杆率，加剧了资产泡沫的生成，也放大了泡沫破灭带来的冲击。

表2 1980年代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时间	具体措施
1984年	允许商业支票和海外存款证在国内销售；取消日元兑换限制，允许日元自由兑换
1985年	证券公司开始受理存款证，并提供大宗公司债券投资信用
1985年	推出利率联合浮动型可转让存款证书、市场利率联动型存款等大量利率金融衍生品
1986年	东京证券交易所放松会员资格要求，外国证券公司可以取得东京证交所会员资格
1986年	开设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允许181家外国外汇专业银行参与市场
1987年	创立国内商业票据市场

从房地产看，监管层对于资金流入地产领域持鼓励态度。1981—1990年，日本银行业直接对不动产领域的放款比例从5%左右提高至10%左右（见表3）。与1985年相比，1990年日本对房地产领域的贷款增加了近30万亿日元，增幅达210%。而为逃避信贷监管，日本的商业银行还采取一种迂回贷款的方式。先将资金贷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是住房专业金融机构，简称“住专”），然后由住房专业金融机构将资金间接投向房地产与土地领域，或更为直接的将客户引荐给住专，由其发放贷款。由于投向贷款或介绍客户的住专一般由银行持股，因此银行也能间接分享其中的收益。

表3 金融自由化期间日本银行放款结构（%）

时间	制造业	个人	不动产	金融、证券、保险业	贷款余额增长率
1971-1975年	38.9	7.6	5.8	-	-
1976-1980年	33.5	10.4	6.0	2.6	9.4
1981-1985年	28.3	11.2	6.5	4.0	11.0
1986-1990年	20.2	12.7	10.1	9.0	14.6
1991-1995年	15.4	13.7	11.7	10.0	2.1

从股市看，监管层对各类资金进入股市保持默许。一方面，日本在 1984 年放开了资本管制，为外资自由流动进入股市提供了通道与机会，在日元升值、日元资产收益率较高的吸引力下，大量热钱流入日本¹⁴，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进入了股市；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兴起了一种名为“特定资金信托”的理财产品，刚兑且几乎不违约，为日本国内企业、居民与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入股市提供了安全的通道，大量资金借此进入股票市场。结果，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在不断循环过程中越来越多，自发的信用派生直接推高了股票价格。

由于监管放松，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市迅速推高了日本宏观杠杆率。1985—1990 年，日本企业杠杆率提升了 30 个百分点，达到了 140% 以上的绝对高位；居民杠杆率也上行了 16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通缩去杠杆的二十年。在高杠杆率下，股市以及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在泡沫期过度扩张的债务主体资产大幅缩水，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债务负担加重、收入减少、通货紧缩之间相互强化，导致日本企业和居民部门在泡沫破灭后去杠杆过程十分缓慢，给日本带来了巨大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复苏的难度。数据显示，日本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自 1995 年开始才出现较为明显的下行，这意味着在 1990 年的日经股市泡沫与 1991 年的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并未实现有效冲销，直到 2009 年去杠杆才基本见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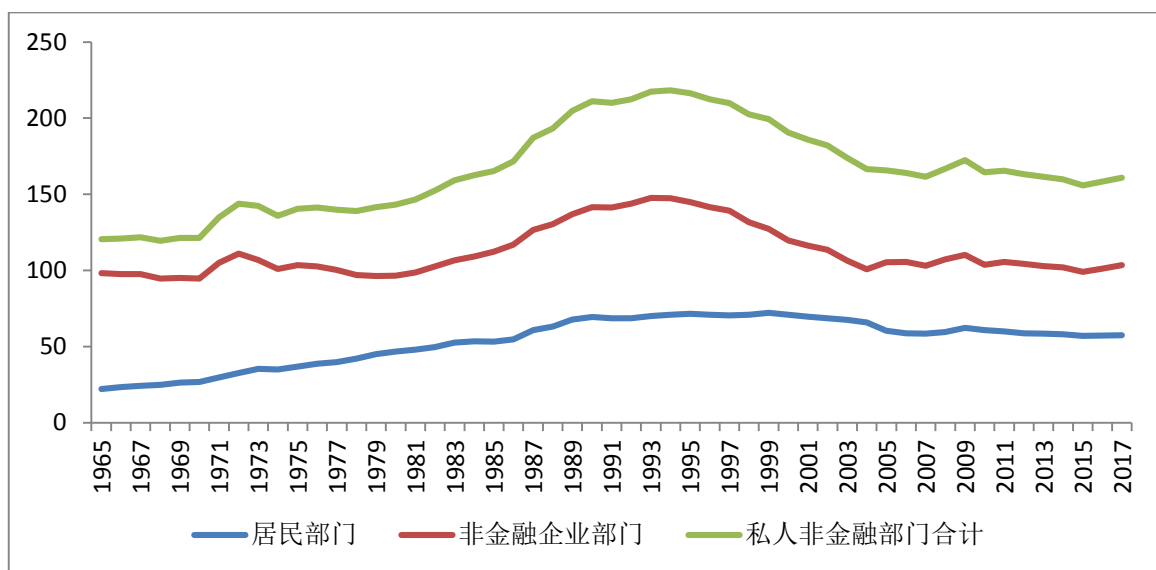


图 3 资产泡沫破灭前后日本私人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变化情况 (%)

从日本 1980 年代后期泡沫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下的监管放松，提升了同等条件下债务扩张的能力，便利了企业和居民的融资行为，使信贷资金更容易流入到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上行，在助长泡沫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泡沫破灭后的通缩压力。摩根士丹利对

¹⁴ 1989 年 4 月东京外汇交易市场日均交易额达 1152 亿美元，比 1983 年 4 月的 125 亿扩张了近 8 倍。如此大规模的国际游资进入股票市场，很容易使股票市场暴涨暴跌，带来市场的不稳定，但大藏省对此默不作声，并没有进一步加强跨境资本监管。



1600 年至今的经济数据分析发现，如果一国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与 GDP 的比值在五年之内增幅超过 40% 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将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陷入危机。比如，日本在私人非金融部门负债占 GDP 的比值超过 200% 的时候爆发了 1990 年经济危机；美国在达到 170% 的时候就爆发了次贷危机。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不足，金融机构缺乏风险意识与规则意识导致投机泛滥所致，在主动去杠杆过程中必须坚持货币中性与严格监管并举。

五、从人口因素看，少子化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社会总需求萎缩，进一步增加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复苏的难度

泡沫破灭后，日本社会陷入一种低沉的状态中，年轻人晚婚、不婚，进而导致晚育甚至不育，使日本人口难以正常增长，驶入少子老龄化的快车道，一代年轻人被称之为“平成废物”。

一方面，人口少子老龄化使得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下降，直接拉低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1990 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除了“泡沫经济”提前透支经济发展成果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等因素外，人口少子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降低同样成为拖累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且这种影响是持续的、长期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数据显示，1990—2007 年，美国工作年龄段人口增长了 23%，工作年龄段人口的人均 GDP 增长了 31.8%，GDP 增长了 66%；日本工作年龄段人口下降了 4%，工作年龄段人口的人均 GDP 增长了 31%，GDP 增长了 25%。对比美国和日本的数据看出，这一时期两国工作年龄段人口的平均经济产出基本相同，两国之间 GDP 增长的差距主要是受人口结构的影响（见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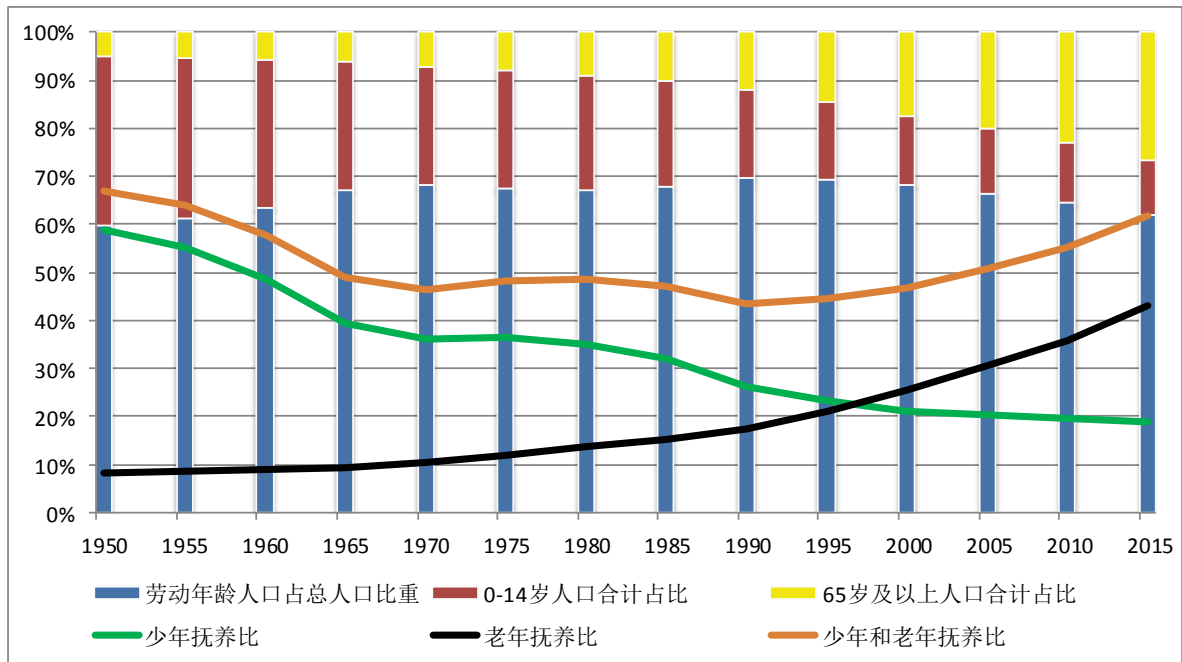
表 4 1990—2007 年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情况对比

	GDP 累计增长	工作年龄段人口人均 GDP 累计增长	工作年龄段人口累计增长
美国	66%	31.8%	23%
日本	25%	31%	-4%

另一方面，人口少子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将从根本上拖累日本长期经济增长。1980 年代起，日本少年抚养比不断下降，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社会抚养比在二者的此消彼长之间于 1991 年降至 43.3% 的低点。1997 年，日本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开始超过少年抚养比，二者均近 22%。2014 年，日本社会抚养比又回到战后初期的水平，约 63.3%，但此时日本社会主要的供养负担则变为老年人，其中，老年抚养比 44%，少年抚养比 19.3%（见图 4）。受此影响，日本近年来社会福利成本高涨。目前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社会福利，政府财政赤字逐年上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预测，日本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将在未来成为抬升社会负担的根本原因，在 2075 年时达到峰值，预计约为 85.5%，少年人口抚养比则持续稳定在 15% 左右的水平，届时，社会抚养负担将超过 100%。



表 4 1950 年以来日本人口结构变化情况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年轻人晚婚、不婚，进而导致晚育甚至不育，使日本人口难以正常增长，形成社会少子化现象，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为“国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日本年轻人价值观多元化，不少人乐于享受，却不愿承担家庭负担。而且，年轻人收入普遍过低，无力结婚。另一方面，日本的养老金等福利制度负担沉重，难以为继，让青年人倍感悲观，不愿承受更多社会负担。尽管日本政府对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建立育儿休假制度、普及对伤病儿童的护理休假制度、扩大幼儿园、增强对婴幼儿和孕妇的保健服务等，但是低生育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在教育、社会保障、女性独立等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时，单纯靠政府宣传引导，或只从一方面入手解决是难以奏效的。周而复始，少子化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



参考文献

- [1] 黑田东彦. 日本汇率政策失败所带来的教训[J]. 国际经济评论, 2004 (1-2) .
- [2] 李翀. “广场协议”是导致日本“失落十年”的原因吗? ——一个经济史的谜的解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 .
- [3] 山田泽明. 日本对外投资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金融, 2010 (3) .
- [4] 王允贵. 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与经济萧条——日本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失误的经验与启示[J]. 国际经济评论, 1999 (7-8) .
- [5] 张冠楠. 少子老龄化缘何成为日本“国难” [N]. 光明日报, 2018-1-20 (8) .
- [6] 张季风. 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J]. 日本学刊, 2013 (6) .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Fric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AO Jianmi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ngoing escalation of Sino-US trade conflic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Japan-US trade conflict in the last century. What we found is that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 wasn't the effective measure to ease trade conflict, and a country's macroeconomic policy decisions should be based more on domestic realities than external pressures. Especially, we should acceler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meanwhile, asset bubbles and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should be prevented, and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should be highly concerned.

Keywords: Japan-US trade, Trade Conflict, Experience and Lessons